

The Jiankang Empire in Chinese and World History

Andrew Chittick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411 pages, ISBN 978-019-0937-5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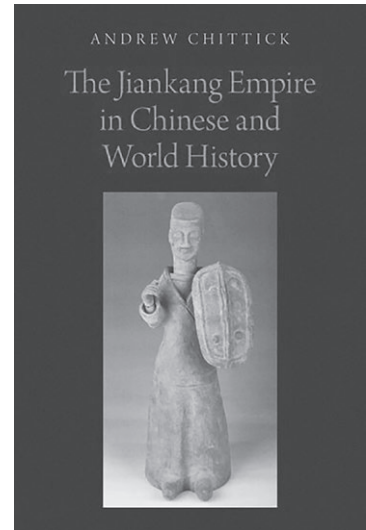
本書作者戚安道（Andrew Chittick）係美國 Eckerd 學院 E. Leslie Peter 講座教授。本書旨在考察建康帝國在東亞及東南亞史中的地位，及其社會性質的獨特性，並反思傳統民族主義史學文本敘事對論述建康帝國的局限作用。作者以歐式的中世紀帝國史觀而非中式的「南朝」來定義這一時段，正是嘗試突破此一文本限制所作出的努力，分別從江南原住民認同、建康政治文化與正統性等三個方面，對於建康帝國在公元三世紀至六世紀的族群認同及國族構造展開思考。

全書正文共分成十二章。第一章是對全書的介紹，著者認為過往中、美、日學界的「六朝」、「南朝」等定義，本質上是一種中國中心史觀。這類史觀容易抹滅建康帝國自身的國族構成，強調要從南方族群的中間地帶來理解建康帝國的東南亞性。二至四章論述江南原住民的身分認同及民族識別。第二章主要辨析了渡江吳人、本土吳人、楚人與中人幾組概念，反思永嘉南渡以降華北菁英給江南族群帶來的影響。第三章考察江南的自然環境及飲食，作者著眼於生態環境給予本土族群的認同，並思考生態與飲食在南北朝時期如何被貼上政治標籤。第四章考察江南本土語言，討論南方語言生態的多樣性、語言認同如何上升到國族認同，眾多南方語言中吳語在菁英層的社交中所扮演的角色。五至七章論述建康朝廷的政治文化，尤其是宮廷政治與駐軍軍團的關係。第五章談及淮河前線的重要性，並具體分析了吳、東晉、宋、梁、陳的軍事部署，探討特定軍事組織活動下對民族認同的影響。第六章闡述建康宮廷對駐軍的效應與東南亞國家的曼陀羅體系類似，但其中的差別是建

康有一套相對完善的官僚體系，這是東南亞國家所不具備的。作者強調環

境決定論，即這類駐軍官兵在長期的組織活動下，會使其身分認同發生重要轉變，這也是分析建康楚人軍團的重要面向。第七章談及建康帝國的財政與商業，分別從建康都城的商業職能、土斷前後的財稅、貨幣體系，以及佛教對商業的影響等方面進行探討。值得一提的是，對於建康帝國的南海貿易，作者認為過於強調這類貿易的「朝貢性」並不妥當，這對建康帝國而言是一種雙邊外交。此外，在建康特有的政治處境下，有發展海外貿易的必要。

八至十一章是對建康正統性的思考，分別從江南本土文化、中原文化、佛教國家等方面論證。第八章通過考察蔣子文、吳太伯、伍子胥等江南本土崇拜，反思大一統中國中心史觀對本土文化的消滅作用。但另一方面，江南本土族群在長期地域活動下文化流動性的增強，也是造成本土消滅的重要原因。第九章考察建康帝國中的華夏元素。作者認為晉宋之交是江南文化認同的一大分水嶺，原因在於無論是孫吳還是東晉，尚存在以華北為文化正朔的思想；而自劉宋以降，流寓政權的影像淡化，建康逐漸成為了全新的華夏文化中心。對於文化認知的轉變，繼而輻射到建康帝國的城市、史學、文學以及宗教藝術中。第十、十一章，主要談及建康帝國如何從宗教多元到佛教國家，及隱藏在這一轉型中之內驅動力。重點考察佛教在建康外交體系中的作用與佛教



發展的社會基礎，進而理解佛教語境中的「天下」所給予梁、陳二代的認知，最後得出「梁武帝弘揚佛教，旨在回應宋、齊兩代的統治危機，從而推動國家的行政改革」這一結論（頁 322）。第十二章是對全書的總結，重新思考建康帝國在全球史中之位置。作者強調，要認識到歷史話語在分析具體民族問題時的局限性，以及大一統帝國的普遍主義在分析地方問題時的困境，如此才

能更好理解建康文化對唐末五代、唐宋變革的輻射及其在東南亞史中的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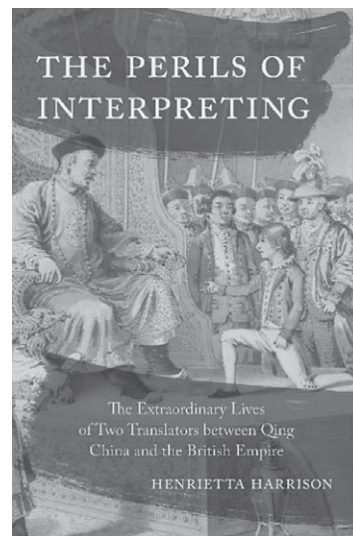
綜觀全書，作者旨在對中國中心史觀下的江南族群自我認同做出回應，進而對大一統民族的歷史敘事進行深刻反思，對魏晉南北朝史研究提供了嶄新的視角與思路。（王冠淇，澳門大學歷史系大學生）

The Perils of Interpreting: The Extraordinary Lives of Two Translators between Qing China and the British Empire

Henrietta Harris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1

312 pages, ISBN 978-069-1225-45-6



1793年英國馬戛爾尼使團來華事件向來被視作是前現代的帝國與步入現代文明之歐洲國家的一次正面接觸。以後見之明觀之，這是中國主動「睜眼看世界」的最後一次機會。不過事與願違，乾隆皇帝沉迷在天朝上國的迷夢中，證明了一個停滯的中國。然而，這種認識僅僅是一瞥短促的歷史場景，缺乏對歷史中鮮活生命的洞見。牛津大學教授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別出心裁，以覲見使團中的兩位譯者為切入點，從個體生命史的視角析離出歷史格局演化的進程，將宏大敘事難以觸及的歷史脈搏傳遞給讀者，可謂匠心獨具。

本書的兩位主人公，一位是為馬戛爾尼伯爵擔任口譯的中國人李自標，另一位是時年 12 歲的英國少年小斯當東（George Thomas Staunton，為與其父 George Thomas 老斯當東區隔，以下行文概以斯當東稱之）。兩人共同

擁有一種跨文化的

世界觀，構成覲見場景中的一對焦點，恰好說明 1793 年覲見不是一次文明的碰撞，而是不可避免的全球化進程中最早交匯的細流之一。

全書正文共有四章。第一章交代李自標和斯當東之遊歷和成長過程。李自標來自涼州（今甘肅武威）一個本土的天主教家庭。1771 年，11 歲的李自標追隨神父郭元性來到那不勒斯的一所訓練中國傳教士的修會中學習，成為虔誠的天主教徒。斯當東的父親則是馬戛爾尼的副使，斯當東自幼受到身為耶穌會士的老斯當東之博雅教育。第二章詳述李自標何以被選中擔任英國使團的翻譯，以及在訪華行程之後李自標的遭遇和去向。在充當口譯者的過程中，李氏的翻譯並不出於英國或中國的現實利益考慮，而是本自天主教徒的信仰。相對於傳